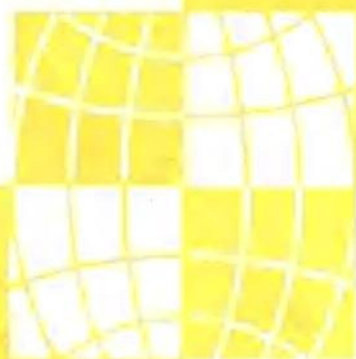


经济管理改革

问题与探索

苏、李、丁、陈、胡、周、王、张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Рефор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и поиски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 Г. Аганбегя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ономика»
Москва, 1987
根据苏联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版译出

经济管理改革

(问题与探索)

JINGJI GUANLI GAIGE

(WENTI YU TANSUO)

主编/[苏]А·Г·阿甘别吉扬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

封面设计/王师颜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13,000

版次/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4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39-3/F·11 定价 3.50 元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

前言、1

2

3

4

5

6

7

8

9

代结束语、简介、附件

全书由张达楠统校

张达楠

乔木森

史俊弟

张 础

宣 森

李 禄

尤艳琴

卢玉玲

陈义初

张达楠

中译本序

苏联当前的改革从今年开始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实践的阶段。在这以前，从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到1987年下半年这两年八个月的时间是改革的第一阶段，这是为改革进行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的一段时期，也可以说是改革的准备阶段。

在第一阶段，苏联不断加深对它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和苏联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的认识，批判了长期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在一些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和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从而为这次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前提，并通过发扬民主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苏联的社会现状作出清醒的估计，对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和以往的教训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明确了进行改革的历史必要性。与此同时，苏联在这二年中继续进行从1984年就开始的扩大企业(联合公司)的权限和加强它们对工作成果的责任的经济试验。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最后在1986年中制定了根本改革苏联经理管理体制的蓝图、目标、措施和步骤。这就是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通过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原则》，以及得到这次全会赞同后于6月30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这两个经济体制改革

的基本文件。接着,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又于7月17日就计划体制、物资技术保障和供应体制、财政体制、价格形成体制、银行体制的改革和提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作用、改进统计工作、改组物质生产领域各个部和主管部门的活动、完善共和国管理机关的活动、加强实施社会政策的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十个具体决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和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综合方案。《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原则》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制定和通过,标志着改革的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从今年1月1日起生效,今年将在占全国工业总产值60%的企业中实施,明年苏联全部企业都将按此法进行工作。

苏联在这两年多的改革进程中相当重视理论研究在改革中的重要意义。这两年苏联理论界呈现出相当活跃的局面,特别是经济理论界在研究和探索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6年11月13—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经济管理的科学组织问题》全苏讨论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由苏联著名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阿甘别吉扬主编的这本专著《经济管理改革(问题和探索)》,就是这次讨论会成果的反映。

这次讨论会的中心目的是要明确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问题,也就是新的管理体制的理论模式问题。事实上,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后两年多来,苏联一直在探讨新的经济体制的构想问题。苏联学者十分强调弄清经济机制的总体构想或理论模式的重要意义,认为只有把构想搞明确,才能看清楚改革的最终目标,看到为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创造的条件和经历的步骤,才能保证在不同时间出台的各种措施之

间的前后一贯和相互协调。从根本上说,这个总体构想就是用一种新的管理体制来取代苏联在30年代形成的、后来虽有修补但一直沿续到现在的那套行政命令管理体制。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要制定这一构想的任务,但到1986年底,苏联的有关部门尚未制定出这一构想来。于是,这次全苏讨论会就承担了制定这一构想的任务。

这次讨论会开法新颖,规模很大,约有1000名学者、专家 and 实际工作者参加了讨论。讨论会之前,就由阿甘别吉扬、波波夫和米尔纳等著名经济学家领导的一个综合小组向与会者提出了一个带结论性的综合报告,阐述他们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统一构想和一系列基本观点。会上的讨论是围绕这个报告进行的。为了准备这个报告,共成立了8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负责起草报告的一个部分。本书发表的9篇专题论文就是这个报告的9个组成部分。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总体构想。除阿甘别吉扬写的第一篇论文外,书中发表的每篇论文的后面都附有讨论会对该篇论文的讨论综述,包括会上提出的不同意见和建议。

这次全苏讨论会对明确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构想,制定苏联新的管理体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果把本书同去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通过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原则》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联系起来阅读,就可发现,苏联经济学家们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的许多意见和建议已被吸收到这两个基本文件中。

本书是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后印刷出版的。可以看出,论文的 authors 已在他们的原作中补充了六月全会的一些新内

容。阿甘别吉扬为本书写的《代结束语》则提出了苏联经济学家在六月全会后所面临的新的研究任务。

苏联目前的改革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的热烈兴趣和关注。对苏联改革的理论、构想、措施和步骤，对苏联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对苏联改革的前景等等问题，各国学者都在进行研究和讨论，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苏联当前这场社会经济改革，正在开始而尚未充分展开，已取得某些初步成就但尚有大量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有待解决。今天在观察和研究这场改革时出现不同的评价和看法，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为了实事求是地了解和研究苏联的改革，我们觉得需要把苏联的改革放在苏联本身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去加以考察，需要认真地去了解和研究苏联经济学家自己对苏联经济改革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了解他们的观点和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从思想理论上去全面了解苏联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一把钥匙。同时我们认为，本书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在研究我国的经济改革时值得加以研究和探讨的。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决定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奉献给我国的读者。

本书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一部分研究人员集体翻译的。限于我们的水平，同时由于时间仓促，译文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至希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

徐 葵

1988年1月25日

前 言

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制定一种具有发展前途的管理模式，实现这种模式可以提高对经济进行集中领导的效率并同时扩大企业和联合公司经济核算自主性以及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自筹资金的范围，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物质利益原则和物质责任原则。彻底改革管理的经济机制，必须同改造组织结构、同做好经济干部的工作、同使管理进一步民主化有机地结合进行。只有完整的新机制能够同完整的以行政方法为主的管理体制相抗衡。

1986年11月13—15日由经济科学协会、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分部和苏共中央《经济报》周刊共同召开的“经济管理的科学组织问题”全苏讨论会，对制定新的管理体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次讨论会的开法是，在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上主要是讨论事先起草并分发给与会者的关于制定完整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综合报告（共分9部分）。很多著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综合报告的起草工作，各专题组对这些材料展开了讨论。

在起草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问题时利用了经济学家的这些研究成果以及其他材料。

目 录

前言	1
1. 经济管理改革概论	1
2. 经营机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30
3. 集中计划领导的经济方法	68
4. 基本经营环节的自筹资金	105
5. 按劳分配机制	144
6. 管理的组织结构	176
7. 地区计划工作和管理的改革	213
8. 经济领导干部工作体制的发展	241
9. 劳动集体参加生产管理	277
代结束语	311
“经济管理的科学组织问题”全苏讨论会简介	314
附件1 “经济管理的科学组织问题”全 苏讨论会组织委员会名单	317
附件2 在全体会议上阐述综合报告要点的 报告人名单	319
附件3 讨论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人名单	320
附件4 讨论会专题组及专题组领导人名单	322

1. 经济管理改革概论

(苏联科学院院士 A·Γ·阿甘别吉扬)

在分析对社会主义生产管理进行根本改革，转向新的管理体制和新的经营机制的问题的时候，首先搞清楚改革的宗旨十分重要。

1.1. 新的管理体制的目标和标准

首先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对管理进行根本改革？

原来，有两种倾向在暗中进行较量。一种倾向认为我们的管理体制并不怎么坏。诚然，它有很多东西已经过时，但是对它可以进行改进和完善。所以当我们对很多报刊文章进行内容分析时就会发现，它们经常使用“改进”、“更新”、“完善”等字样。换句话说，现行管理体制应保留，但是它的个别成分，个别方面要改进，要完善。这就是所谓主张渐进的倾向。

另一种倾向表达了对管理进行根本改革，也就是进行根本改造和实现革命性质变的意向。这种立场的出发点是，现行管理体制在主要方面总的来说与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和新的任务不相适应，它阻碍它们的现实，不可能通过改变个别成分

得到改进或完善，而是需要对它的所有基本组成部分进行彻底改造。与新的经济任务相适应的是新的经营机制，要形成新的经营机制，就必须对管理进行根本改革，而不是采取局部措施去改进它的个别方面。

现行管理体制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形成的，是为了解决另一些任务。在它形成的时候，经济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吸收补充资源来实现的。当时的典型条件是，每5年国民经济职工人数增加1000—1100万，燃料和原料产量增加25—30%，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0—50%，固定生产基金增加50—60%。

那时我国在生产规模上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1950年我国的生产量大约为美国的1/3。当时提出了首先在生产规模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任务。

可是，从那时候起，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源增长率大约减少了2/3。例如，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只增加了2%，而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不会增加。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燃料和原料产量提高8%，而不是提高25—30%，基本建设投资增加16%，而不象过去那样增加40—50%。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固定生产基金将增加30%，而不象过去各个五年计划那样增加50—60%。因此，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因素的比重应大大减少，应把经济转到以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上来。

当前形势的另一个特点是，世界上正在展开具有明显特点的新阶段的科技革命。因此，经营机制应当着眼于加速科技进步，应当对科学和技术的要求特别敏感。

同时必须强调指出：今天我们正经历一个揭示人们的巨大社会需求的时期。人的因素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因此，管理民主化的问题，管理应着眼于解决社会任务的问题具有了与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的意义。

总之，条件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也就提出了新的任务。其中主要的战略任务是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旧的经营机制已不适应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

说实在的，对经营机制、管理体制和我国的各种经济形式进行根本改革的目的，就是改进落后的生产关系，使它们更充分地适合发展新的生产力的需要。

其次一个问题是，新的经营机制面临哪些具体任务？能否找到某种标准，形象地说，能否找到某种试纸，用它去测试具体建议就可以说：这个不行，而这个多少还可以，应当进行认真研究。

任何事情，更不用说象建立经营机制这样重要的事了，都必须从确定目的开始。我认为，新的经营管理体制应当解决的任务可以分五大项：

（1）新的经营机制应当做到使生产直接服从于满足社会需求的任务，消除业已形成的由生产者操纵的局面，结束短缺现象，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既有效又保持动态平衡。

短缺经济不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在短缺条件下相当部分的产品不能满足现实的社会需求，因而是多余的。因此经常出现可以说是反常的情况。例如，1985年我们生产的钢要比美国多90%，而同时我们又花好几亿外汇卢布去进口钢铁。我们生产的拖拉机要比美国多3.8倍，可是我们还在耶拉布

格市建造拖拉机工厂,理由是拖拉机不够。

可是,当我们使集体转向从经济逻辑的观点来看是合理的条件下工作时(例如在库班地区的某些集体农庄就采用了集体承包制,承包的劳动集体本身只付租用技术设备费),就会发现,集体农庄现有的包括拖拉机在内的农业机械中有40%(有时还更多一些)根本不需要。

在我看来,这是改革经营机制的关键任务。我们应当想方设法尽快做到,在建设工程项目时将有二三个建筑单位提出方案,并就谁建设得又好又省又快进行竞争。这样一来,发包单位要做的事将是选择,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到处去“苦苦寻找”承包单位,“央求”建筑人员正常开工和按时竣工。或者,冶金工厂的厂长将向机器制造业的工人提供各种质量越来越好,而且使用起来不用多大加工的钢材,如此等等。

(2)第二个任务是保证经营机制具有反消耗性质并以提高效益为目标,保证经济转到集约化轨道。我们面临的现实任务是: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相比,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应当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平均提高50%;65—70%的对燃料和原料的补充需求额,应当靠节约和降低消耗定额来满足;基金产值率的幅度应当提高两倍。而所有这一切都要靠新的经营机制来实现。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为此做了一些什么。就拿工业部门大规模经济试验的具体结果来说吧。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实际上取得了多大的提高?只提高10—20%。可是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任务要高得多。其次,燃料和原料是否节约了?在这方面的试验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和明显改变。

基金产值率的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实际上没有改善。

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虽然总的来说试验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结果（如计划和合同的履行情况有所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有所增加，成本比以前有所降低），但是在效益问题上目前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和进展。

因此，需要继续前进，完全有必要继续探索更有效的经营形式。从1987年起，5个工业部的企业将仿效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和苏密机器制造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按自筹资金的办法进行工作。应当认为，这种办法对挖掘提高效益的潜力和可能性将起更彻底的作用。

如果展望一下90年代，那么新的经营和管理体制将在什么时候发生作用？要知道，90年代负有更快地加速前进的任务。如果说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应当增长22%（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16.5%），那么第十三个五年和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收入就必需各平均增长28%。而且这是要在90年代资源增长额将减少的条件下做到的。因此，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必须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3%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4%增加到第十三个五年和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7%。对燃料和原料的补充需求额的75—80%将要靠节约来满足。同时要求到90年代中期从根本上扭转国民经济基金产值率下降的趋势，先使基金产值率稳定下来，然后开始增加。而在最近15年里，基金产值率每5年平均下降14%。

对任何一项试验的条件和结果，都可以根据这些目标和任务来进行检查。同时要看到，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将是最困难

的五年计划。它面临两项任务：一项是要实实在在地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另一项是为今后各个五年计划期间规模更大的加速准备条件。而在当前的五年计划期间还不可能充分利用提高效益的科技因素，因为资产的更新，产品的换代，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广泛采用都需要时间。

这里举一个例子。高尔基汽车制造厂生产小功率的汽油发动机的普通卡车已经有近 20 年的历史，现在它准备生产新型号的汽车——大功率柴油发动机的汽车列车“嘎斯—6308”。这种汽车的燃料消耗量为每百公里 14 升（原来的卡车为 19 升），带拖车可拉 8.5 吨（原来的卡车为 4.5 吨），大修前的里程由 25 万公里增加到 35 万公里，维修费用降低了一半。司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 70%。但是，较大的效益要到国民经济中开始大批更换汽车的时候，也就是要在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获得，而最大效益则要到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第二批工程投产时才能获得。

由此可见，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挖掘经济组织的潜力和社会潜力才能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为此就需要改革经营机制。

在现有经济基础的条件下，也就是依靠更好的劳动态度、效率更高的工作、生产质量更好的产品、节约材料和资源等等，能否挖掘出提高效益的巨大潜力？在这方面根据个别的一些试验情况来评论，并把试验的结果机械地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是不行的。正确的做法是，要对经济管理的几次大的改革结果进行评价。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来回忆一下 1965 年的经济改革。这

是一次大改革，它在 1964 年就在工业和农业中开始了。这次改革经济成果丰硕。“八·五”计划的各项主要指标都好于“七·五”计划，具体来讲，“七·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 32%，而“八·五”计划期间增长 41%。同时，各种生产资源的增长额“八·五”计划要小于“七·五”计划。因此，根据我们计算，“八·五”计划期间的社会生产效益的增长速度要比“七·五”计划高一倍。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加快了半倍。如果说“七·五”计划期间燃料和原料实际上没有什么节约，那么“八·五”计划期间节约的燃料和原料却十分可观。基金产值率在“七·五”计划期间急剧下降，而在“八·五”计划期间已接近稳定。所有这些结果基本上都是依靠经济组织因素取得的。

（3）经营机制改革的再一项任务，就是刺激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本身是个矛盾现象，它既有渐进的方面（即改进现有的技术和工艺，等等），又有革命的方面（即向新一代技术过渡）。对于我们既定要进行的如此重大的加速事业来说，需要把重点放在科技进步的革命方面，可是直到最近渐进的发展仍占主导地位。大家知道，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已经规定在这方面要有非常大的进展。现有固定生产基金的积极部分的更新系数，在上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到 3%，而在当前这个五年计划中打算达到 6.2%。1985 年机器建造业的产品替换系数只有 3.1%，而到 1990 年计划提高到 13%。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所生产的符合现代水平的设备和机器的比重，从现在的 29% 提高到五年计划结束时的 80—90%。因此，在科技进步领域里我们所需要的主要是质变、革命性的进展。经营机制

应当适应这种进展。

(4)还有一项同协调经济利益有关的任务。大家都清楚,在现行经营机制中,职工、企业、部门、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利益是不一致的。现在,经营机制本身在很多方面就使他们的利益互相对立。由于任务是由统一规定的,所以企业感兴趣的是制订指标低的计划,总想隐瞒自己的潜力,也就是说,它们的利益是与社会利益有矛盾的。因此,经济利益应当协调的标准就成了衡量新经营机制质量的一条标准:这种机制应当鼓励职工和劳动集体去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5)最后,扩大经济民主的问题十分重要。经营机制应当有助于人们发扬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些问题受到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1987年)的注目。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指出,由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向民主的管理体制过渡的基础是,明确划分各个组织的职能,根本改变它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经济科学的总任务在于,深入研究可用以对关于建立新经营机制的建议进行全面评价的目标和标准。

1.2. 新经营机制的总构想

当我们谈论新经营机制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彻底摧毁同旧经营机制有关的一切东西。

我们的社会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的,也就是说有着普遍规律和普遍原则,它们既反映在旧经营机制中,也反映在